

尊孔反华挽救不了苏修新沙皇覆灭的命运

沙洋分校大批判组

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之争，绝非一般的学术之争，归根结底，它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明显的表现。与此相联系，在历史上存在的“尊孔反法”与“尊法反孔”两种对立的思潮和派别，也绝非出于人们的某种偏爱，而是由于人们所处的不同的阶级地位和利益决定的，是和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紧密相联的。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无不利用他们手里所掌握的政治特权，鼓吹“尊孔反法”反动思潮，为其反革命事业服务。

在这股反革命逆流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们近年来在“尊孔反法”问题上，大开黑会，大做文章，肆意歪曲历史，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他们一面把孔老二打扮成什么“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一面凭借孔孟之道，无耻地颂扬反革命暴力，恶毒地咒骂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调门愈扯愈高，火药味愈来愈浓。二千多年前“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孔老二，现在在莫斯科居然成了一个招摇过市的“摩登圣人”，岂止十分行时，简直是红得发紫。对于这类问题，鲁迅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苏修尊孔反法，根本目的在于反华。它一面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进行武装侵略威胁；一面千方百计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妄图从我们内部进行颠覆活动。苏修挥舞着“尊孔反法”的破旗，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正是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这样的现代中国的孔老二，把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伙叛徒、卖国贼身上。这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又一次大暴露。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疯狂挑战，我们必须给予迎头痛击！

苏修在“崇古”问题上颠倒是非，目的是复辟资本主义

“崇古”就意味着倒退和复辟。这一点，苏修叛徒集团心里当然明白，他们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颠倒了儒法之争的本质，他们一方面吹捧儒家“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前景”①；另一方面却攻击法家是“古”的合法继承者，胡说“法家并不打算破坏这种传统的基本核心——对‘古’的崇拜。”②这分明是一种贼喊捉贼的栽赃手法，是对历史的肆意篡改，是他们为自

已步老沙皇的后尘，推行崇古复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辩护，是他们为刘少奇、林彪一伙开倒车、搞复辟撑腰打气。

儒法之争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正是我国历史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公室衰微”，“礼崩乐坏”，奴隶制统治已是岌岌可危。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积极要求变革，田氏取齐，三家分晋，纷纷向奴隶主贵族展开夺权斗争，这反映到政治思想领域，就出现了儒法之争。儒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他们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派；法家以商鞅、荀子、韩非为代表，他们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学派。儒家和法家正是在“法古”与“师今”这个关键问题上，各自提出了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分别代表着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这两个绝然不同的政治倾向。事实证明：崇古、复辟、反革命的不是法家，恰好是哪个为苏修所讴歌的儒家。

马克思说过：“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44页）当时作为奴隶制度基础的“井田制”已土崩瓦解，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正在形成，法家思想的产生，正是经济基础变革在上层建筑的一种反映。然而“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29页）当时作为“古”的象征，就是奴隶制极盛时期的夏、商、周“三代”，以及尧、舜、禹、汤、文、武这一批所谓“先王”。法家为了给社会变革开辟道路，对于这些代表旧传统的“先王”、“先世”，必然要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商鞅在变法前，就曾经与秦国奴隶主贵族甘龙和杜挚就“古”与“今”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甘、杜正是根据儒家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复古主义理论，极力反对秦国变法。商鞅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提出了“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等著名的反对旧传统的论点。③为秦国变法改革、用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扫清了道路。

从儒家中分化出来并倒向法家的荀子，也斥责儒家是“呼先王以欺愚者”。④并指出：“舍后王而道上古者，譬之犹舍己君而事人之君也。”⑤法家这种厚今薄古理论，到韩非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他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系统地批判了开倒车的儒家显学，提出了“圣人不能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著名理论，耻笑那些腐儒是“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指斥儒家“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⑥从而戳穿了儒家布下的复古主义骗局。法家这种反对旧传统的历史进化思想，不仅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思想武器，同时也为秦代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是那个被苏修捧为“开辟了新的前景”的儒家，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又在干什么呢？儒家的开山鼻祖孔丘，是一个梦不见周公就感到活不下去的家伙，⑦他口口声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⑧要人们“信而好古”向后看。他的政治蓝图就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君从周”。⑨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如有用我，吾其为东周乎！”⑩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就是“克己复礼”，“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⑪要把当时较先进的齐国，倒退到较保守的鲁国，再从鲁国倒退到奴隶制极盛时期的周公之道。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分明是开历史倒车，那谈得上什么“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前景”？！

被称为儒家“亚圣”的孟轲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当时就有人指出他是一个“守旧术，不知世务”^⑫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当时的形势是：“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⑬各国的变法，大大加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可是孟轲却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的反动立场，发出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悲鸣，他认为“五霸”是“三王”的罪人，诸侯是“五霸”的罪人，现在的士大夫又是诸侯的罪人。^⑭其所以是“罪上加罪”、“一代不如一代”，无非是那些诸侯、士大夫接二连三地破坏了奴隶制的等级制，有乖于禹、汤、文、武，孔子之道。试问：这到底谁是“古”的合法继承者？是谁崇古？难道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其实，一切反动的、没落的阶级总是鼓吹“崇古”、“复古”，用旧传统来对抗革命洪流，维护自己腐朽的事业，孔孟之流是这样的吹鼓手，苏修和他的走狗林彪，也是这样的吹鼓手。苏修叛徒集团之所以在“崇古”这个问题上颠倒是非，尊孔反法，无非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明明是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全盘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极力推行崇古复辟的反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对内镇压革命人民，对外扩张侵略的社会帝国主义，成了两代王朝，一条黑线；明明是卖国贼林彪，捡起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崇古复辟，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投靠苏修当儿皇帝，却贼喊捉贼地污蔑“中国人民很难排除三千年来崇拜皇帝所形成的习惯”，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接受了很多帝制中国的理论遗产”^⑮。苏修叛徒集团这种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既骗不了人，掩盖不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真相，也救不了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

苏修肆意美化儒家的“仁政”，其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以虚构的手法，肆意美化儒家的“仁政”，这是苏修鼓动的“尊孔反法”反动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叫嚷：“孔子和孟子都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⑯孟子是对“当时社会罪恶的一切作斗争的不倦战士”，^⑰又是“民主性”，又是“人道主义”，还有什么“最高的道德品质”^⑱等等。然而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在血腥的剥削制度下，居然有这么一种美妙的“仁政理论”和“仁政政府”，这只能是苏修贩卖的“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黑货，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臆造出来的奇谈怪论。

恩格斯在驳斥杜林先验主义道德论时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第91页）在阶级社会里，对一个阶级是“仁政”，对另一个阶级来说就必然是“不仁之政”。不错，孔老二曾经说过：“仁者爱人”，但他绝不是爱所有的人，更不是爱奴隶。毛主席指出：“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都知道，孔老二的《论语》对于“人”和“民”的含义是有严格的区别的，“人”主要是指奴隶主，而“民”是指奴隶。整部《论语》充满了“民可使由之”，“使民以时”这类反动说教，却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过“爱民”，孔老二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民”，这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看来，“民”只不过是一种役使的对象，绝不是爱的对象，这是一。

第二，孔老二在回答颜渊问仁时讲得更清楚：“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①9}这是孔老二反对社会变革，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所谓“礼”，就是严格区分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奴隶制等级制。很明显，孔丘是把“仁”作为“复礼”——复辟奴隶制的一种手段。所谓“仁不怨君”、“仁人不党”，就是针对当时各国行变法，分公室，夺政权的情况说的。他企图以“仁”来制止奴隶主贵族的分化，扼杀新兴地主势力的发展，挽救奴隶制统治的危机。

第三、儒家鼓吹“仁政”的目的还在于束缚人民的思想，瓦解人民的斗志。孔老二讲得很清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②0}这就是说，政令只能惩治于“犯上作乱”之后，而“仁政”、“德治”却能防患于未萌。所以孔老二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②1}。“仁”的实质就在这里。这一点，孟轲也是很露骨的，他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②2}，“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②3}这分明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那里有什么“民主性”与“人道主义”？！那一点谈得上“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的”？！清代思想家戴震曾经指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②4}足见儒家“仁政”的欺骗性与残酷性。其实，儒家鼓吹“仁政”、“德治”，并不意味他们放下屠刀与皮鞭，他们从来都善于使用“德威并治”，“宽猛相济”的反革命两手。春秋时，郑国的奴隶曾集于“萑苻之泽”起义，郑国统治者对他们进行血腥镇压，“尽杀之”。孔老二闻之，竟欣喜若狂地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就是说，对老百姓仁厚宽大，老百姓就调皮。调皮，就狠狠地镇压。这大概也算是苏修颂扬的孔孟对于“千百万人民的命运的真正儒家式的关心”^{②5}吧！

孟轲讲“仁”的确讲了不少，但具有“经典性”的是：“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②6}在他看来，要行“仁政”，就要复辟“井田制”，“井田制”恢复了，奴隶主的世袭份地和俸禄就有保证了。试问：孟轲到底是关心谁的利益？！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不倦战士”？！他在向谁作斗争？！战国时有个许行，他主张“并耕而食”，反对剥削，听说滕文公依靠孟轲行“仁政”，便由楚至滕，经过一番考察后就看出问题了，派他的学生陈相去质问孟轲说：滕的仓廩府库充实，是榨民取利，怎能说是“仁政”？！孟回答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饲）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②7}短短的几句话，充分暴露了孔孟“仁政理论”的反动阶级实质。孟轲有意把剥削与被剥削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歪曲为社会必要的分工，再以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去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明目张胆地鼓吹“剥削有功”，“剥削有理”这一套极端反动的理论。这大概也可算是孔孟的“最高道德品质”了。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如此狂热地吹捧孔孟的“仁政”，决不是偶然的。正当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叫嚷：“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阴谋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正当林彪一伙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要对那些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施行“仁政”，“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的时候；在莫斯科的阴暗角落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什么“仁政”、“人道主义”，这不正是一种心心相印，遥

相呼应吗？！这不正是主子在给走狗撑腰打气吗？！说穿了，他们正是打起“仁政”、“人道主义”的破旗，作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武器。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他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早就泛滥成灾了。勃列日涅夫早就鼓吹什么：今日的“苏维埃社会”，已成为“人道主义的现实体现”，这里的“民主”，已“发展为对一切人的民主了”。其实，勃列日涅夫、林彪和孔老二一样，都是十足的伪君子，他们把自己标榜为“仁政”、“人道主义”的崇拜者，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反革命专政。苏修的所谓“民主”，就是沙皇式的专制独裁；苏修的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十足的法西斯主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在今日的苏联，集中营、“精神病院”遍布全国，警察暗探横行无忌。他们给苏联革命者扣上“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罪名，加以血腥镇压，明目张胆地为叛徒、托派、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平反、翻案；他们把亿万劳动人民踩在脚下，却把一小撮特权阶层捧上了天。他们所实行的，正是孔孟所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精神贵族的反动统治，苏修对儒家“仁政”的狂热吹捧，恰好暴露他们与孔孟本来就是一丘之貉。

苏修恶毒攻击法家和“焚书坑儒”，实质是反对革命暴力

苏修叛徒集团，一面肆意美化儒家“仁政”，一面恶毒咒骂法家的“残暴”。他们胡说：“法家学说中包含着一系列反动的概念：奖战、愚民、严刑、明察”^{②8}，污蔑法家要把“所有能批判地思考的人”加以“清除”^{②9}；咒骂秦始皇是“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③0}；攻击“焚书坑儒”是“毁灭文化”、“活埋学者”^{③1}等等。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暴力的问题。

恩格斯在驳斥杜林的唯心论暴力论时指出：“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关于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反杜林论》第181页）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既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和不同作用的暴力，我们在谈论专政和暴力的时候，必须牢记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个基本事实，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暴力，从而确定自己应持的态度，坚决拥护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而修正主义者却总是有意混淆不同的暴力的性质，借口所谓反对暴力来反对革命暴力，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当年的杜林以及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所谓反对暴力的共同实质就在这里。

法家的变法与“焚书坑儒”，果真是残暴的、反动的吗？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我们说：变法与“焚坑”既然是反对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当然不可能是什么仁慈的东西，问题在于区分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也就是区分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

公元前383年，楚悼王任命前期法家吴起变法，锋芒直指奴隶主贵族，剥夺了他们的世袭份地，禁止他们干预政事。但由于奴隶主的疯狂反扑，他们利用楚悼王之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乱箭射死吴起，把他剁成肉酱。试问：这到底是谁残暴？！是谁反动？！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法家商鞅变法，他“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废分封，置郡县”，“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为秦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但奴隶主复辟势力利用秦孝公之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车裂肢解商鞅，并“灭商君之家”。试问：这又是谁残暴？！是谁反动？！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质是新兴地主与奴隶主贵族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复辟与反复辟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秦始皇兼并诸侯、统一中国的事业，是新兴地主阶级顺应历史潮流，凭借人民力量取得的重大胜利。但奴隶主复辟势力并不罢休，他们一次又一次向这个新生的封建政权发动猖狂的挑战。丞相王绾鼓吹恢复分封，反对郡县制；儒生博士淳于越之流，“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引据《诗》、《书》，是古非今，咒骂“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②以侯生、卢生等为代表的一批反动儒生，诽谤法治是“专任狱吏”，攻击中央集权是“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咒骂秦始皇“专横跋扈，自以为是”，到处煽阴风，点鬼火，阴谋进行反革命夺权。秦始皇坚决打击了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实行“焚书坑儒”。他焚的是私藏于民间、“是古非今”的儒家经典，坑的是死心踏地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孔孟之儒。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确立之后，必须在政治上，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强化本阶级对已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革命专政。“焚书坑儒”绝非出于法家和秦始皇的“残暴”，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法家和秦始皇在当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采取了果断措施，这绝不是他们的“历史罪过”，恰好相反，正是他们在历史上的杰出贡献。

奇怪的是，如此热衷于所谓反对暴力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叫嚣“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③、亲手杀害法家先驱少正卯并暴尸三天的孔老二，却不置一词；对孔老二叫嚷：“陈恒弑其君，民不与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极力怂恿鲁哀公以反革命暴力镇压齐国的新生力量，也不吭一声；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射死吴起、车裂商鞅、杀害李斯等一系列血淋淋的“坑法”事件，更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却偏偏抓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坑儒”事件大肆歪曲，大加渲染，大做文章，可见他们反对一切暴力是假，反对革命暴力、拥护反革命暴力是真。在林彪一面策划反革命政变，一面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苏修如此恶毒攻击法家和秦始皇所实行的革命暴力和革命专政，只能暴露他们完全同当年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卫道士们一个鼻孔出气！同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个鼻孔出气！

其实，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大肆鼓吹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在国内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对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洪流，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压制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另方面却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相勾结，以他们的反革命暴力去“主宰世界”，争夺霸权。苏修如此恶毒攻击法家和“焚书坑儒”，只不过是他们那种极端反动的“暴力观”又一次暴露罢了。

至于所谓“毁灭文化”，其实也不值一驳。历来的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绝对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文化。孔孟的儒家经典，在当时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工具。为什么烧不得？！为什么烧了就是

“毁灭文化”？！其实，古代许多有识之士对这类谰言早已识破。宋人郑樵说：先秦典籍，“非秦人之亡也，学者自亡之耳。”^{③④}清人刘大櫟在《焚书辨》中讲得更清楚：“六经之亡，非秦亡也”，“道古而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③⑤}这里应该指出：真正造成文化“浩劫”的，正是苏修所吹捧的孔老二，是他制定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反动原则，鼓吹为奴隶主隐恶扬“善”的所谓“春秋笔法”，开创了任意篡改历史的先河，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至于说，要把“所有能批判地思考的人”加以“清除”，也决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孔老二曾疯狂叫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③⑥}，把一切不符合他口味的学说都看作“异端”，“邪说”，发誓要予以铲除，只不过他力不从心，未能办到。到了西汉初年，他的忠实门徒董仲舒再度鼓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③⑦}结果出现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事实证明：不是法家清除了儒家，恰恰是儒家清除了法家。苏修叛徒集团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如此颠倒是非，歪曲历史，其真正的目的，是借此诽谤和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我们连续粉碎了长期隐藏在党内的、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华阴谋接连破产。借反法骂秦来发泄他们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这不过是苏修无可奈何的一种哀鸣和嚎叫罢了。

苏修采用这种拙劣的手法，其实也是为他们自己在国内疯狂镇压“所有能批判地思考的人”的血腥罪行辩护，为他们竭力保护封资修的一整套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辩护。试想今日之苏联，剥削阶级思想到处泛滥，而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却遭到严重摧残？！有多少劳动人民惨遭镇压？！有多少革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所有这些，苏联人民心里是清楚的，世界人民心里也是清楚的，这一笔账总有一天是要清算的。

在历史问题上的斗争，历来总是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和一定的阶级利益连系在一起的。列宁指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列宁全集》第2卷471页）苏修叛徒集团早已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社会主义蜕变为十足的社会帝国主义。他们如此热衷于“尊孔反法”，不惜请出孔老二的亡灵，给他披上社会帝国主义的服饰，大动干戈，打上门来，无非是出于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是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这样的现代中国的孔老二，以便使这些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所谓“健康力量”，在中国说出“决定性的话”，也就是妄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专政，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可见，苏修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鲁迅早就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早已失灵了，“尊孔反法”救不了苏修新沙皇必然覆灭的命运，历史早已雄辩地证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总是要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正是“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林彪一伙策划的反革命复辟已被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也彻底垮台了，等待着苏修叛徒集团的必然是无可挽回的彻底的失败。

注:

- ① 苏修《新世界》一九六九年第十二期
- ②②② 苏修《远东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 ③ 《史记·商君列传》
- ④ 《荀子·儒效》
- ⑤ 《荀子·非相》
- ⑥ 《韩非子·五蠹》、《显学》
- ⑦ 《论语·述而》
- ⑧ 《礼记·中庸》
- ⑨ 《论语·八佾》
- ⑩ 《论语·阳货》
- ⑪ 《论语·雍也》
- ⑫ 《盐铁论·论儒》
- ⑬ 《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 ⑭ 《孟子·告子下》
- ⑮⑲ 苏修《历史问题》一九七三年第五期
- ⑯ 苏修《历史问题》一九六八年第十期
- ⑰⑳ 苏修《历史问题》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 ⑱ 《苏修历史百科全书》一九六五年俄文版
- ⑲ 《论语·颜渊》
- ⑳㉑ 《论语·为政》
- ㉑ 《论语·学而》
- ㉒ 《孟子·梁惠王下》
- ㉓ 《孟子·尽心上》
- ㉔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 ㉕㉖ 《孟子·滕文公上》
- ㉖ 苏修《文学报》一九六九年第三十四期
- ㉗ 《史记·秦始皇本纪》
- ㉘ 《荀子·坐宥》
- ㉙ 郑樵：《通志》卷71
- ㉚ 刘大槲：《海峰文钞》
- ㉛ 《汉书·董仲舒传》

(上接97页)并妄图通过反革命的武装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同孔子一样,他的反动政治纲领,也是以他所代表的反动阶级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同样是为了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用他们自己的黑话来说,就是让一小撮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孔子没能挽救住奴隶制的最终崩溃;封建地主阶级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后,利用孔子学说作为统治思想,也没能挽救封建王朝的最终崩溃;林彪同样阻挡不了奔腾向前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潮流。他们都只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1974年2月4日《光明日报》)